



人间佛教
研究论丛

主编

饶宗颐 校
何子文 编

佛教僧人的社会身份及其近代转变

何子文 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人间佛教
研究论丛

主编

楼宇烈
魏英

佛教僧人的社会身份及其近代转变

何子文 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佛教僧人的社会身份及其近代转变 / 何子文著；楼宇烈，怡藏主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9.

ISBN 978-7-5188-0261-6

I . ①佛… II . ①何… ②楼… ③怡… III . ①僧侣—身份—研究—中国—近代
IV . ① B94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18227 号

佛教僧人的社会身份及其近代转变

何子文著

出版发行：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64095215（发行部） 64095265（编辑部）

责任编辑：王志宏

版式设计：武俊东

印 刷：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787×1092 毫米 16 开 13.5 印张 200 千字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88-0261-6

定 价：40.00 元

人间佛教研究丛书

主 编：楼宇烈 怡 藏

副 主 编：净 因 圣 凯 张志强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邓子美 王 颂 王雷泉 孙英刚 池丽梅 李四龙
纪华传 李建欣 陈 兵 陈金华 陈永革 杨曾文
杨维中 张风雷 张文良 宋立道 何建明 学 愚
洪修平 麻天祥 黄夏年 赖永海 魏道儒

编辑编委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义 广 圣 凯 向 学 伍先林 可 潜 永 平 宗 性
净 因 昌 如 明 海 明 杰 济 群 持 定 定 明
张志强 能 仁 湛 如 惟 善 惟 祥 智 海 源 流

主编机构：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
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院
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
雪窦山佛教协会

项目执行：

能 仁 定 明 法 雨
持 定 惟 祥 永 平

总 序

两汉之际，佛教经由古代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从印度传播到中国，积极主动地与中国社会制度、思想文化、民众生活激荡融合，逐渐形成了丰富璀璨的中国佛教。反思中国佛教的发展，每个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时代需求，也是佛教“契理契机”精神的具体体现。清末民初，西方文化的传播，国家与民族的危机，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题，“人生佛教”或“人间佛教”应运而生。

20世纪20年代初，佛教复兴运动领袖太虚大师（1890～1947）针对当时佛教界重视前生来世、以“天”“鬼”为中心而忽视现实人生的倾向，特提出“人生佛教”理念予以对治。太虚大师认为佛教的精神与方向是重视现世人生问题的解决，学佛的目的是研究宇宙人生真相、为人类社会进步做出贡献。太虚大师主张在坚持佛教根本精神的立场上，适应社会潮流的变化，契合时代需求，保持佛教在时代社会中的发展与进步。1933年10月，太虚大师在汉口市商会作《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的讲演，又明确提出要建设“人间佛教”。由太虚大师创办的佛教期刊《海潮音》杂志特地出版了“人间佛教”专号。“人间佛教”由此成为中国佛教界继承传统、别开生面的一股新思潮，获得广大佛教徒和社会人士的大力支持和热烈赞同。

“人间佛教”思想提出近百年来，已成为主导当代中国佛教实践追求的新方向和中国佛教现代化的新道路。1981年，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撰《佛教常识答问》，第五章的最后部分为“发扬人间佛教的优越性”，开启了大陆佛教在“文革”后对“人间佛教”的正式倡导。1983年，赵朴初

居士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二次会议上作《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报告，强调了提倡“人间佛教”是中国佛教向何处去的答案。他在报告中明确提出以“人间佛教”作为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方向，将弘扬“人间佛教”置于整个中国佛教发展的指导地位。“人间佛教”理念由此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指导方针，“人间佛教”思想在中国佛教现实社会生活各层面得以深入贯彻。喜饶嘉措、圆瑛法师、巨赞法师、正果法师、明真法师、净慧法师等一大批近现代高僧大德为人间佛教思想的实践与弘扬贯注了无数心血和智慧。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作为中国佛教协会举办的佛学研究和文化交流机构，一直致力于整合教内外研究资源，联合学术界共同开展多角度、跨学科、系统化的佛学研究，推动佛学研究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促进佛学研究国际交流，不断提高佛学研究的国际化水平。关注人间生活，践行人间佛教，是中国佛教发展和振兴的必由之路，也是两千多年佛教发展历程中总结出来的实践经验。

中国佛教又重新站到一百多年前的历史机遇——一个中西文明汇遇的时代，互联网所带来的信息革命，对中国佛教的弘法、传播具有根本性的变革意义；商品经济对当代中国佛教的经济、制度乃至修道带来巨大的冲击。太虚大师圆寂至今将届70周年，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当此殊胜因缘，特别联合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院等科研机构组织《人间佛教研究丛书》，试图梳理人间佛教思想的内涵与源流、总结人间佛教实践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展望人间佛教的未来发展方向，积极顺应时代需求，以促进当代中国佛教界形成一种普遍的思想自觉。因此，从历史的总结、当前处境的反思中，为中国佛教现代化与化现代的实践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与方向的指引。

《人间佛教研究丛书》编委会

2016年9月

目 录

总 序	1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1
第二节 相关文献研究回顾	3
第三节 研究问题的提出	16
第四节 研究方法	23
第五节 研究意义与价值	28
第六节 文献资料的说明	29
第二章 宗教身份的社会定位：宗教、公民身份与身份整合	32
第一节 身份、身份认同与多重身份问题	32
第二节 公民身份：身份认同、权利和实践	38
第三节 宗教与公民身份：宗教身份的社会定位	47
第三章 传统中国佛教僧人身份的建构	61
第一节 何谓僧人	61
第二节 中国佛教僧人的定义	63
第三节 佛教僧团的发展	70
第四节 “方外之宾”的退隐：僧人与国家	74
第五节 佛教僧人身份认同结构的非均衡性	78

第四章 国家危机与佛教僧伽的身份转型	84
第一节 个人与公民：近代危机中的转变	84
第二节 国家危机中的僧伽身份危机	91
第三节 重新发现佛教：国家危机中的佛教救国运动	93
第五章 僧人身份认同的重构：从僧伽到公民	98
第一节 僧伽也是公民	98
第二节 僧人的权利与权利实践	104
第三节 护教与救国：认同问题	119
第四节 定义新僧伽：从僧团到教团	128
第五节 文化公民身份认同的形成	134
第六章 菩萨公民：身份认同整合中的社会边界	138
第一节 菩萨公民：身份认同的整合	138
第二节 身份边界识别的紧张	145
第三节 人间佛教的道路：重建僧伽身份的象征认同	158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162
第一节 菩萨公民身份的多重意义结构	162
第二节 在现世中建构僧伽身份的神圣性认同	168
第三节 宗教身份研究：对本项研究的检讨	173
参考文献	184
后 记	204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上海玉佛寺寺内有一个弘一图书室，每次去那里查阅佛教资料时，在进图书馆前与下午离开时我都会往图书馆对面的弘一法师铜像望上一眼。弘一法师中年出家，后被尊为南山律宗第十一代世祖。他那传奇式的出家经历勾起了我对近代中国佛教的兴趣。与这一时期大部分的佛教僧人一样，国家民族的屈辱和危机、生灵的苦难和佛教末法时代僧伽的衰颓，这一切在他们的出家修行生活中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刻下了深深的印痕。民国成立肇始，尚未出家的弘一法师填了一首《满江红》，抒发自己伤时爱国的情怀，表达对新中国的期盼，“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①也深切表达了法师对国家社会的关切与忧愤之情。而面对佛教的现状也曾使法师伤痛不已，——1935年10月，弘一法师应邀在福建泉州承天寺律仪法会上演讲“律学要略”时，曾悲痛地说过这样一番话：“我有一句很伤心的话要对诸位讲：从南宋迄今六七百年来，或可谓僧种断绝了！以平常人眼光看起来，以为中国僧众很多，大有达至几百万之概；据实而论，这几百万中，要找出一个真正比丘，怕也是不容易的事！”^②由此可见救国护教的危机感对于法师思想言行的影响。国家民族救亡的时代主题和振兴佛教、“绍隆僧种”^③的信仰使命，影

① 中国佛教协会编：《弘一法师》，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43-44页。

② 弘一大师：《弘一大师讲演录》，台中市佛教莲社印行，2000年，第25页。

③ 李叔同：《李叔同说佛》，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5页。

响着他们对问题的思考和行动。

实际上，翻阅中国近代史，从晚清直至民国，亡国灭种的危险时时警惕着当时的国人，救亡图存成为那一时代的主题，任何人、任何一种文化思潮或社会运动，都无法摆脱这一主题的影响。佛教也不例外。而近代中国佛教自身的问题，正如前面弘一法师的批评，一方面是出于生存发展的压力，另一方面则由于社会变迁和国家转型以及西方外来文化冲击所带来的严峻挑战，使得早已深深嵌入中国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佛教也同社会结构的变革一样，经历着由传统的出世佛教向积极入世佛教的转变。无论是德行高远、持律精严的高僧，如印光、圆瑛、倓虚、太虚等人，还是一些热血青年僧人如慈航、大醒、巨赞等人，都以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并在运动中把国家民族的命运和佛教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提出“护教救国”的口号，显示出积极入世的转变。这种入世转变还体现在僧人积极争取或要求获得公民身份的行动上。近代民国成立初期，佛教僧人积极争取公民身份，要求公民权利。不少先知先觉的佛教僧人就上书参议院等政府机构或政要，要求保护佛教财产及相关权益，积极联络全国僧众以成立全国佛教统一组织，把公民身份的精神体现于实际的行动当中。如1912年太虚法师在《上参众两院请愿书》中，即要求政府给予佛教应有的地位，不应钳制佛教发展；佛教徒同其他国民一样享有平等权利。在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期间，僧人更是表达出“僧尼也是国民”。“我们学佛是非要一个‘人身’不可的，我们做中国的僧尼也非得要一个中国的‘公民资格’不可”^①的心声，显示了僧人权利意识的增强和身份认同意识的增强。

此外，这种变化也可以从一系列体现在对教义的新诠释、佛法观念、居士佛教与寺僧佛教的关系变化、儒佛关系、弘化取向、僧团发展及其管理、佛学思想的发展等方面看出，体现出近代中国佛教与传统佛教不同的积极入世、理性化、组织化和制度化的特征。如近现代中国佛教的入世取向，积极参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理性化的特征，不仅从教理教义上论证佛教是理性的宗教，而且试图从教制上、组织上加强佛教的

^① 大醒：《僧众服役与训练》，《海潮音》第17卷8号。

理性化、制度化，如广泛成立了许多地方性的佛教社团，建立了佛教发展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中国佛教会；居士佛学的兴起，近代中国的居士佛学不仅在佛学研究水平上有着很高的成就，代表了当时的佛学研究水平，而且开创了现代佛学教育的先声，如祇洹精舍和支那内学院，以及僧界所建立的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等新式佛学僧才教育体系，其中培养的许多佛学人才成为了近代中国佛教复兴改革的中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近代中国佛教紧密地介入了社会变迁的具体过程之中，并通过自身的调整和变革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现实。

近代中国佛教的这些转变，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既是一种“教义学”的演进和社会适应，是佛教的沟通符码重新普泛化的过程（卢曼，2003），或者说佛教重新构建或定位其象征性角色的过程（韦尔南，2001），其实质是佛教僧伽象征性身份的转变和重构。

第二节 相关文献研究回顾

一、近代中国佛教的研究

近代中国的社会危机和现代国家的构建方式深深影响了这一时期的佛教。“佛教救国”“庙产兴学”、反宗教运动以及僧伽服兵役等等看似矛盾实则内在一致的现象，深刻体现出民族性的救亡图存这一时代主题对佛教的影响。这种影响是社会性的，也是政治性的。来自外部社会变化的挑战和佛教内部衰败的危机，使得佛教也面临着严重的身份危机，佛教界不得不重新思考和定位其在现代国家建设中的社会角色问题，即“佛教是什么”的问题，产生一个“向何处去”的现实问题。^①实际上，在这一特殊时代背景下佛教的转型问题或身份重构的问题，既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也构成了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国佛教的学者们的问题意识和研究兴趣。

^① 高振农：《佛教文化与近代中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序。

陈荣捷在《现代中国的宗教趋势》(*Religious Trends in Modern China*)一书中专辟一章谈近代中国佛教的现代化运动。陈氏认为,近代中国新佛教运动的智识成果和取得的成就是一种追求新生活的象征。这种追求体现为七个方面的不同发展倾向:1)在研究上,从天台和华严哲学转向唯识论;2)在宗教体验上,从净土法门到虔诚主义;3)在实践上,从律宗和禅宗到密宗;4)在经籍上,从汉文经藏到巴利文和藏文经藏;5)在态度上,从仪式表演到宗教示范;6)领导上,从出家僧人到在家居士;7)在超越性上,从追求彼世到此世超越(Chan, 1953: 62)。在书中陈氏还谈到中国佛教的组织性问题。他认为中国佛教从未有过一个全国性的教会组织,即使是在近代太虚创办一个统一的中国佛教会组织的努力过程中,佛教内部对此也是不冷不热的(Chan, 1953: 58)。关于中国佛教的组织性问题,不少研究中国佛教的中外学者都曾阐发过类似的观点,即基本上都认为中国佛教内部组织的散漫、组织化程度低。而且这种情况一直到今天似乎仍旧未有改变。

近代中国是中国由传统王权专制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时期,随着国家权威的重建过程,国民政府对社会的各个层面逐步加强了其行政权力的渗透和控制。因而,这一时期佛教与国民政府之间所展开的政教关系的互动与调整成为了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重点。东初法师的《中国佛教近代史》史料丰富、论题深广,堪称鸿篇巨作。其中第一章导论别置一节专书“近代中国佛教之护国”,其寓意不仅值得体会,也正说明了中国佛教的性格与佛教当时所处的现实,与著者今日对此问题的思考。“历史上告诉我们,佛教前途与国家命运,具有相互为缘的关系”。^①陈金龙的系列文章则分别从庙产兴学和佛教僧伽制度整理的角度,分析了民国时期的政教关系。他认为南京国民政府与佛教界之间,既有合作与协调,也有冲突和对抗。冲突与调适是南京国民政府与佛教界互动关系演进的基本轨迹。同时也分析了佛教与政府间存在冲突的根源。(陈金龙, 2006a, 2006b, 2006c)

近代中国佛教复兴思潮影响深远,李向平(1993)把这股复兴思潮概括为“救世与救心”两个内在统一的主题。他在书中仔细梳理了这场佛教复兴

^① 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东初出版社,1984年,自序。

思潮的分期和演变，将之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救世（以康有为为代表，包括谭嗣同、梁启超）；二是救心（由章太炎肇始，包括欧阳竟无、释太虚等人）；三是哲学总结（梁漱溟、熊十力，熊十力为殿军）。着重分析了近代佛教复兴思潮的两个重要特点：一是以居士佛学为主体；二是主要围绕着唯识佛学的复兴而展开。居士佛学突出的人世性推动了佛教复兴和“人间佛教”的历史发展；同时，居士佛学的“主智论”信仰态度也影响了近代佛教信仰的知识化、理性化趋向。作者指出，大乘佛教的出世传统、其无私无畏、自贵其心及其佛陀与众生平等的教旨，经中国知识分子的改造、吸收和利用，不仅成为了一种救世救心的哲学体系，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进行社会批判、开展救世救心思潮的理论工具和方法。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佛教传统的改造利用，在西方汉学家看来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体现。这种情况带来了对佛教的重新认同、复兴和重建。因为佛教不仅可以为知识分子提供与西方文化平等对话的资源，重建民族的文化自信；而且也成为知识分子重建中国新秩序的理论基础（Wright, 1959: 111）。在关于“中国佛教的遗产”问题的讨论中，莱特（A.F.Wright）认为现代中国佛教的遗产存在于两个层面：一是佛教成为思想、语言、文化的构成元素；二是佛教构成了中国人自我认同意识的成分。他们通过复述、使用佛教传统中的元素以应对中国传统文明在面对现代西方影响下的问题和困境，——尽管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在如何理解佛教与中国原有文化之间的互动过程上可能存在差异。在莱特的立场上，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努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做是佛教试图解决其所面对的新的合法性危机的一个现象。（Wright, 1959: 108-127）

孙永艳的硕士毕业论文《杨文会与近代佛教复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历史。她的论文提醒我们注意近代中国佛教复兴的文化根源，她认为，批判正统儒学、重建民族文化使佛学成为近代“以复古为解放”思潮的中心。作者把佛教复兴的实质看作是一种思想解放的潮流。^①而《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一书则把近代中国思想家思想上的这种与佛学的联系概括为“宗

① 孙永艳：《杨文会与近代佛教复兴》，《法藏文库——中国硕博学位论文》，台湾佛光山文教基金会印行，2001年，第42册。

教向度”。并从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等三个方面论述了思想家们思想上的这种“宗教向度”。在我看来，这种宗教向度的体现和表达不仅仅是思想家个人的“宗教性”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它反映了一个社会性的和政治性的问题，即文化的出路与国家建设的问题。

《二十世纪中国佛教》一书分析了佛教界人士在主动回应挑战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四种趋势或转型：发扬传统、学习外求、反本归源和改革鼎新。该书主要从教团、教义和社会功能三大方面考察了以汉传佛教为主的近代中国佛教所体现出的变化，即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该书的其中一位作者邓子美在《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书中，从对韦伯论述宗教与现代化之关系的讨论出发，试图以近代中国佛教的现代转型过程为例子，探讨佛教在近代中国中西文化交往冲撞和中国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的角色，而其背后的学术旨趣则似乎在于探讨文化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问题。

探讨近代中国佛教转型与复兴问题的还有中山大学萧平的博士毕业论文《中国近代佛教复兴与日本》。萧平把近代佛教复兴的标志归结为出版事业、居士佛教、国际化的观念、全国性佛教组织的形成、汉藏佛教文化的交流和唯识思想的流行等六个方面。虽然这些学者的研究给我们很大的启发，但应当指出的是，近代佛教的复兴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现象，任何一种概括和探讨都应该既考虑到佛教本身的情况，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当时的社会现实对佛教的影响，也许还应该与佛教此前的传统有一个对比，以一种整体的、历史的观点来看待这一问题。正如美国著名的中国佛教研究学者维慈（Holms Welch）在谈到近代中国佛教复兴的问题时，即明确反对使用“复兴”一词。他认为这一说法犯了三重错误。这三重错误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即所谓复兴，大部分情况只是一系列的革新，是一种世俗化；影响的范围十分有限；“复兴”可能是一种误导，忽视了某种危险的趋势（维慈，2006：218）。维慈以一种担忧的心情描述了晚清民国佛教的衰落，但同时他也指出，民国时期的趋势表明这种衰颓是不可逆转的，但也不乏重新崛起的可能。这种可能来自“中国人是否引进了可供选择的、能更好满足他们人性需要的制度和更切合他们的思维方式”（维慈，2006：222）。维慈的这一段话透露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中国佛教的制度建设的的重要性。这一制度建设的问题，

实际上也是佛教在现代社会如何以一种制度化的方式参与国家和社会建设的问题。

陈永革（2003）通过对民国浙江佛教弘化取向及其弘化方式的研究，也认为佛教“复兴”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整体景象。在佛教皈依者个体化的“出世性”（或宗教性）诉求和佛教弘化的“人间性”（或社会性）愿望之间存在一种结构性的张力。而民国时期佛教弘化正是基于“政教并进”与“政教分立”这一弘法格局的时势判断和在“宗教化”与“社会化”的结构性张力中展开了佛教的现代转型。

“契理契机”是佛法圆融性的重要体现，也是把握佛教历史问题的重要原则。何建明的《佛法观念的近代调适》一书展现了晚清民国时期佛法观念是如何契应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和思想文化变迁而进行创造性调适和更新的。该书认为近代中国佛法观念的更新和调适体现为一个既破又立的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即佛法融入世法，逐渐散失佛法的主体形象；和融世法入佛法，重塑佛法的主体形象。并将之概况为四个主要的特征，即原典化、现世化、理性化和多元化，比较全面地揭示了佛法观念在面对近代社会、科学、政治和宗教观念等的冲击和挑战时的调适问题。在作者看来，“佛法观念的调适”即是指佛教的教理如何以一种适合于中国现在生活需要的方式或新形态来表达。这既是如何对佛法做新的诠释的问题，也是关于佛教的文化定位问题，即佛教契理契机的问题。

在近代中国这一大变革时代，面对西方列强的武力欺凌和西方文化的入侵，传统的儒家纲常伦理伴随着清王朝的消失而失去其原有的“国教”地位。不仅如此，其时的孔教因被当作愚昧的体现和阻碍了中国发展而被当作反面形象受到知识分子的大加挞伐。面对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危机，佛教适时地被作为一种保护民族文化心理自尊和抵抗西方文化入侵的工具和手段而受到当时知识精英们的热宠。如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炳麟等人当时无不是深究佛理，引之为救国救世的思想资源。章炳麟更是提出了“佛教救国”的倡议。这既是引致近代佛教复兴的一个“外缘”，也是近代佛教从出世向入世转变的时代社会背景。一些学者分别从儒佛关系的调整、居士佛学的兴起、太虚发起的现代佛教改革运动、佛学研究等不同视角研究了近代佛教的入世

性、理性化、现代化的转变及其特征（杨惠南，1991；刘成有，2002；李远杰，2002；罗同兵，2003；麻天祥，2005）。

此外，台湾学者蓝吉富还研究了20世纪初期中国佛教的反传统倾向。这种反传统倾向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以支那内学院为主的“回归印度佛教”而贬抑传统中国佛教，评破《楞严经》和《起信论》中所体现出的对中国佛学体系的反思，以及“居士弘法”现象和居士道场的兴起，这标志着传统的以出家人为主的佛教教团形式开始动摇。“这些反传统倾向，显示出传统的中国佛学与教团形式，已不能完全为现代人所接受，对传统中国佛教之全面价值重估的时代，已经来临。”^①由此可见，近代中国佛教的转型是一个有破有立、破中有立、立中有破的复杂过程，其中的保守与革新、批判与辩护既展现出历史的复杂性，同时也说明如何理解佛教身份认同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上述诸多学者的研究大多是从观念史、思想史和宗教学的视角研究近代中国佛教的社会化变迁与转型，而他们对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也主要围绕着佛教“护教与救国”的实践来展开。近代中国思想家们的佛学思想及其这种佛学思想与社会现实的联系、佛学与新学的关系、由居士佛学（教）先行带动的近代佛教复兴运动的叙述、寺僧佛教的佛教革新运动、人生佛教和人间佛教等方面成为近代中国佛教研究的主要论题。这些研究无疑大大丰富、深化了我们对近代中国社会与佛教的认识和理解，然而同时我们也看到，对近代中国佛教的研究存在研究方法和理论解释方面的狭窄和不足。正如近代中国佛教转型本身所体现出的复杂性，对这一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和解读无论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在理论解释方面，都应该有新的突破，应该通过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以更好地解释这一历史过程。例如，近代佛教僧人对公民身份的要求和积极争取这一事实，构成了近代中国佛教转型过程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而对这一重大问题的分析和讨论，则必须引入社会学甚至政治学的理论视野。在这方面，《信仰、革命与权力秩序》所展现出来的

^① 蓝吉富：《现代中国佛教的反传统倾向》，引自杨曾文、镰田茂雄编：《中日佛教学术会议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34页。